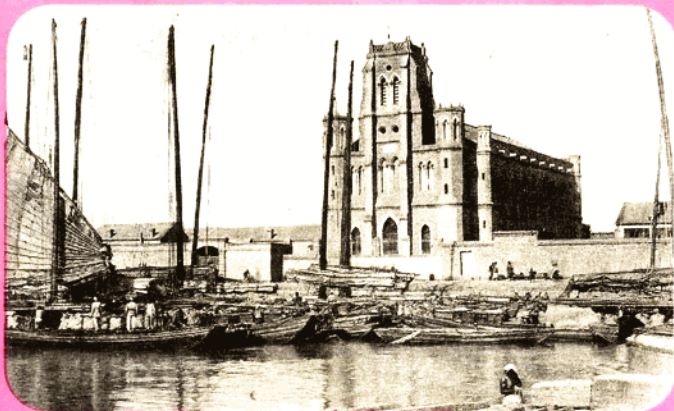


2004. 1

(总第一百零一辑)



- 要目
-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津
 - 忆黄钰生先生二三事
 - 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天津地名券的发行与流通
 - 天津中央银行见闻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2004·1(总第101辑)

600 年回眸

-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津 罗澍伟(1)
- 西方教育传入天津 张绍祖(37)
- 毛主席视察天津新港的前前后后 陈 健(49)

学苑英华

- 忆黄钰生先生二三事 邢公畹 陈 珍(53)
- 铁骨清风 终身良师
- 追忆陈东生先生 曹柏昆(64)

商界才子

- “洋灰陈”三代人 林 放(73)
- 忆近代纺织实业家宋棐卿和东亚公司 李静山(81)

史海撷英

- 洋务运动中的天津洋枪队 田毓芬(103)
《大公报》里的津浦线 翦 安(110)

金融史话

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天津地名券的发行与流通

- 刘仲直(117)
天津中央银行见闻 陈济年(140)
天津中行侨汇券业务大事记
——特定历史时期的见证 刘仲直(158)

名人后裔

- 言子后代——言敦源、言申夫、言次怡
..... 言穆名 言穆新 言缙业(201)
封面照片说明 (80)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津

罗澍伟

差不多距今 800 年以前,在辽阔富饶的渤海湾西岸,在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与九河下梢的海河交汇处附近,一座小小的军事聚落诞生了。历经几百年的风风雨雨,流经身边的河水就像母亲的乳汁,哺育着她一天天茁壮成长;近百年来,伫立于渤海之滨的她,终于脱颖而出,发展成近代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当今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她,就是雄伟、壮丽的历史文化名城——天津。

我国现有历史文化名城 99 座,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古都型的,或传统社会发展起来的历史悠久的城市,像北京、南京、西安、开封、洛阳、安阳、杭州、绍兴、拉萨等;另一类,则是近代型的,是近代成长起来的大城市,像天津、上海、重庆等,这一类城市数量虽然不多,但城市成长速度快,规模大,而且地位非常重要。这些城市不但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中心,而且在许多方面代表了近代中国历史或文化的走向。天津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天津地处大运河的北端,濒临渤海,“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是首都北京的出海口和东大门,地位极其重要;而且,天津的这种区位极便于南北文化、运河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融并蓄。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的侵略,天津还是中国北方最早和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中西文化的撞击,造成了近代天津城市独特的成长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诸多领域开北方风气之先。前人总结说,自鸦片战争起,“吾国外事尽萃于天津,外交之利害,全国之

安危，而恒于是乎卜之”。另一方面，长驻天津的直隶总督身兼北洋大臣，手握军政大权，势力炙手可热，其地位犹如后来的内阁总理，以至“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轫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此外，近代天津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激烈，和革命传统的深厚，也是国内大城市中所罕见的。

古老而又年轻的历史

今日的天津平原，在六七千年以前，还是一片茫茫的浅海。随着大自然的几度沧桑变迁，海水渐渐退去。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一条奔腾咆哮的大河——黄河，夹带着大量泥沙，流经到这里入海，并在入海处淤积成几十公里宽的陆地。这样，海岸线便不断向东推移，并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走向。长期以来，人们传说天津是“退海之地”。近些年，考古学家在天津平原陆续发掘出鲸鱼、海豚的骨骼，以及种类繁多的贝壳，这说明，长期流传在民间的口碑故事，并不是无稽之谈。

由于黄河的冲积作用，使天津平原成为了宜于耕种的农垦区。所以到了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因为铁工具的普遍使用，天津平原进入了全面开发的阶段，而且一天天富庶起来。西汉初年，遂在这里设置了五个县，这就是属于渔阳郡的泉州和雍奴，属于渤海郡的东平舒、章武和文安。现在，天津市武清区的城上村，就是当年泉州的遗址；宝坻区的秦城，就是当年雍奴的遗址；而静海县的钓台村，则是当年东平舒的遗址。

隋朝开通了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把长江、淮河、黄河与今天的海河连接起来。这样，便使地处运河北端，兼有河、海联运之便的天津平原地位一天天重要起来。所以从唐朝时起，这里有了正式名称，这就是“三会海口”，所指的大约就是当年大运河与海

河及渤海湾交汇的地方。

宋朝没有能够统一中国,以致在北方形成了宋、辽两朝对峙的局面。今天的海河以北属辽,以南属宋,海河成为双方的天然分界线,当时被称为“界河”。双方在“界河”两岸戒备森严,设置了众多的“寨”、“铺”等军事据点,分兵把守。其中,武清、独流、当城、沙窝、小南河、双港、泥沽等寨名沿用至今;当地老百姓关于“杨家将”抗辽的故事至今流传不衰。

就在北宋与辽对峙期间,东北地区的女真族逐渐强盛起来,建立了金政权。金先灭了辽,接着又灭了北宋,统治了淮河以北的半个中国。后来,金海陵王把首都迁至中都(今北京),这样,每年就需要把大批粮食用漕船由河南、山东、河北通过运河送到中都。结果地处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一带的“海墙”地区,便成为金朝漕运的重要枢纽。为保证漕船运粮能够安全抵达中都,大约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金朝在武清(今天津武清区杨村镇西北城关镇)和柳口(今天津西青区杨柳青镇)派驻了“巡检”(中级武官),又在三岔河口一带的“海墙”地区设立了“直沽寨”,派有正、副“都统”(高级武官)率兵戍守。

中都成为首都和直沽寨的出现,使天津地区的战略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奠定了日后天津发展的基础。由于沟通直沽南北的大运河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天津地区依河傍海的交通枢纽地位,开始与国家首都的安危与繁荣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尽管“直沽寨”在当时还是个军事聚落,但“直沽”两个字作为天津城市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正式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元朝灭金后,把中都改为大都,仍然作为首都。为了保障大都粮食和日用品的供应,元王朝首先设法恢复了大运河的全线通航。不久因为运河淤塞,又实行海运。但无论河运还是海运,漕船在进入河身狭窄、河床淤浅的北运河前,都必须在三岔河口换载船身小、吃水浅的平底驳船,然后才能北上运到大都。这样,直沽便成

了元朝漕运中转的枢纽。元朝的海运漕粮,分春、秋两季乘季候风北上,每次的运量都在170~180万石上下。这样多的粮食,差不多要用两个月的时间在直沽办理交接、中转和换驳,因此元朝选定了距离三岔河口不远、地势高敞的大直沽作为漕粮转运的管理中心。在大直沽设立了接运厅、广通仓、直沽海运米仓。为保卫交接和转运的安全,又在大直沽设立了临清御河运粮万户府,及所属的镇抚司。在直沽的四周,还调来了大批屯戍士兵,由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管理。

1316年(延祐三年)复在直沽设海津镇,命副都指挥使伯颜率兵镇守。海津镇的设置,说明当时人已经对直沽“河海通津”的重要地位有了深刻的认识。

为乞求海神对往来于江南刘家港与直沽间漕船安全的保佑,大约在1314~1320年之间(延祐年间,或更早),首先在接运漕船的管理中心大直沽修建了天妃宫,但不久即毁于大火;接着又在三岔河口西南的海河右岸,也就是漕船换驳最集中的地方,修建了另一座天妃宫。1326年(泰定三年)又对大直沽的天妃宫重新修建,从此沿海的妈祖文化来到天津。这两座天妃宫是北方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天妃宫;后来,大直沽天妃宫虽然被八国联军破坏,但三岔河口西南的天妃宫一直完整保存,与福建莆田湄洲家庙,台湾港北朝天宫,并称为世界三大妈祖庙。每逢天妃诞辰,天津人民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这在中国沿海大城市中,是十分罕见的。

元朝灭亡后,明朝定都南京,大都被改为北平府,由燕王朱棣镇守。1398年朱棣与他的侄子建文帝展开了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1400年10月(建文二年九月)朱棣率兵由北平沿运河南下,“渡直沽,昼夜兼行”,攻破沧州,取得了首战胜利;不久即占领南京,夺得帝位,改元永乐。

永乐初年虽仍建都南京,但朱棣为燕王时久居北平,深知直沽作为“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决定在直沽设卫

筑城,派兵把守。又考虑到直沽是自己当年率兵渡河、取得胜利、并成为“天子”的地方,因此把在直沽所设之卫赐名“天津”。于是,在1404年12月23日(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直沽设立了天津卫。1405年1月9日(永乐二年十二月九日),添设天津左卫,同时命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等筑城浚池;1406年12月18日再添设天津右卫,这就是天津老城、天津卫、天津三卫和天津等名称的由来。

1421年(永乐十九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这时,大运河已全线贯通,每年要有五六百万石漕粮经直沽运抵北京,因此陆续在卫城内外建立大量屯仓,并在卫城内设立户部分司,以加强管理。为减少漕运投入,朝廷准许漕船上的运军附载南北方的土特产品,免征税钞,这样每年至少有200万石以上的土特产品通过运河北上或南下,运河遂成为变相的商路,漕船和运军也就成了变相的商队。由于直沽地处冲要,“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以至造就了天津“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利京师”的特殊地位。

入清以后,军事建制上不再实行卫所制,所以在1725年(雍正三年)先将天津卫改为天津州,不久又升为直隶州。六年后,也就是1731年(雍正九年),又因天津是“水陆通衢,五方杂处,事务繁多,办理不易”,于是升天津州为天津府,附郭置天津县,并将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及沧州一并归天津府管辖。清代的天津是“府、县同城”,天津府属“冲、繁、疲、难”(地处冲要,事务繁杂,民力疲惫,难于治理)的四字“请旨缺”(天津府缺出,要由皇帝钦定),天津县属“冲、繁、疲、难”的四字“最要缺”,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清代天津城市地位的重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据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也就是《天津条约》的《续增条约》),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

为适应开埠后的新形势,清朝采取了鸦片战争后在广州(后

移上海)设立五口通商大臣的办法,在天津设立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的通商事务,兼办海防。后来因为“天津教案”爆发,朝野上下认识到三口通商大臣没有管辖地方文武的权力,已经不能适应天津华洋杂处、政事繁多的局面,所以将三口通商大臣裁撤,一切事务改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办理。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开埠之后,各方面的地位一天天上升,尤其是在对外交涉和国家防务等方面,其重要性超过了最早开埠的广州和上海。设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不但有权代表清王朝接见各国使节和签订各种条约,而且负责统率清王朝庞大的新式海陆军,权势和地位十分显赫。清王朝非常注意直隶总督的任命,第一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是号称最为精通“洋务”的李鸿章,任职时间长达22年,外国人也因此把直隶总督衙门看成是中国的“第二政府”。

就在天津开埠后的一个月,也就是1860年12月(咸丰十年十月),英国驻华公使便赶赴天津,强划了英租界。随后法国公使也来到天津,强划了法租界。清王朝为了寻求列强之间的力量均衡,后来又让美国在天津划定了美租界。由于租界是列强侵华的产物,所以,此后列强每发动一次侵华战争,天津的租界就要增加或扩张一次。

清王朝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德国硬说自己在战争中压迫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直沽有“功”,1895年在天津美租界以西强划了德租界。翌年,日本强迫清王朝同意在天津等通商口岸设立日租界,1898年日本在天津法租界以北又强划了日租界。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天津被他们分区占领,原来在天津没有租界的俄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纷纷强划租界;原来在天津设有租界的英、法、德、日各国,则疯狂进行扩张。至此,天津一地竟有九国租界并立,这不但在全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天津的开埠和租界的设立,极大地改变了天津的城市地位,传统城市所蕴藏的经济火花很快迸发出来,并迅速燃烧,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便取代了北京的经济地位,一跃而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

开埠前,天津作为水旱码头城市,仅仅是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开埠后成为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在港口贸易的发展方面,被外国人认为是天津城市“潜在的力量”,“来日的发展自不待言”。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天津、大连、汉口、广州的对外贸易额中,已占到13%,其中棉花的出口量几乎占到全国的一半,而畜产品的出口量则要占到全国的60%,居全国各港口出口量的第一位。进口状况也是如此,这一时期天津港的面粉进口量要占全国的35%,同样居第一位;至于棉花、煤油、木材、染料等的进口,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这一时期,天津港的进出口总额已占到华北地区的60%,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

天津的近代工业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但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经过20世纪初期的重建,发展很快,到30年代已经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全市除租界以外,共有工厂1200多家,产业工人达20多万。其中纺织厂680多家,机器制造170多家,其次为化学、食品、建筑、造纸、印刷等,年工业总产值达到7400余万元;工业投资总额低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

天津在商业方面也是北方的中心。20世纪30年代,天津8个区共有商贸行业128个,商店1.7万家,从业人员居全市各行业之首。当时,天津的腹地是华北、西北和东北三个地区,同时也是这三个地区的物资集散中心。

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又拉动了天津金融业的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为方便洋行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的廉价

原料,著名的外国银行,如汇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等纷纷在天津设立分行。不久,华资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也建立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天津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华资银行在天津大规模发展起来,像资金雄厚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中孚银行、大中银行等先后在天津开业。盐业和中南两家的总行虽然分别设在北京和上海,但两家银行的股东多半是居住在天津的官僚和军阀,而且经营重点也在天津。所以盐业、中南、金城、大陆并称为“北四行”,他们的金融实力可与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兴业银行和商业储蓄银行等“南三行”相比照,因此并称为中国南北两大金融集团。

与此同时,天津城市新的繁华区也开始出现。开埠前后,天津城市的繁华区集中在北门外的北大关一带,和以天后宫为中心的官南、官北大街。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以内河港为依托的英、法、日等租界相继发展起来,租界内人口激增,结果天津的繁华中心开始向日租界、法租界和英租界扩展。

到了20年代初,法租界的梨栈地区开始崛起,大型建筑不断出现。1923年国民饭店建成;1926年天祥市场(1993年拆建为劝业新厦)建成开业,压倒了当时天津最大的商场北海楼;同年,基泰大楼(今滨江旅馆)落成,天津最豪华大浴池华清池开张纳客。1927年天祥市场对面的泰康商场也建成开业。在梨栈大街十字路口,1925年浙江兴业银行落成,翌年惠中饭店落成,1928年交通旅馆和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商场劝业场同时落成开业,劝业场地居法租界的中心,楼高七层,场地宽阔,场内高悬著名书法家华世奎的榜书匾额。1935年天津市最高的建筑物渤海大楼建成。1936年坐落在梨栈天增里附近的中国大戏院建成。中国大戏院是当时华北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新大戏院,开幕时许多京剧名家来这里连台演出,场场爆满。劝业场附近的光明电影院,则是当时华北地区规模最大、最先进的电影院。这时,梨栈一带除了著

名的商场和旅店之外,还集中了近 60 家剧院、饭馆、舞厅和浴池,每天车水马龙,热闹非凡,这种景象在国内其他城市是少见的。

天津城市的迅速繁荣,反映了天津作为中心城市财富的集中、人口的集中和经济实力的集中;也反映了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特定地位的形成。

丰富多彩的文化积淀

北方特有的盐文化

天津平原产盐历史悠久,公元 4 世纪的魏晋时期,就有关于沿海地区“民咸煮海水,藉盐为业”的记载。元代直沽人口的集中也与盐业的开发有着密切的关系。1234 年(蒙古太宗六年),三岔河口一带有盐卤自地下涌出,当地官府遂委派旧有的居民高松、谢实等负责这里的盐业生产。由于三岔河口一带交通运输方便,商贩往来频繁,社会进步很快,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这里已是“人得安业,盐如山积”。

明代以来,随着天津城市的成长,盐产区向海河下游的滩涂地带发展。天津的盐业生产,由设于沧州长芦镇的转运使司管理,所以天津出产的海盐也叫长芦盐;因为天津长芦盐质量好,一部分还要作为贡品送到北京。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明代中叶以后,盐的销售方法也一改传统的官府垄断制度,变为交商人运销,办法是:由政府发给制盐人和贩盐人专门的凭证,俗称“龙票”,票面上规定了盐的产量、销量与行销地,彼此不能越界,这就是所谓的“引岸专销”;在这种制度下,天津便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盐商。

产销制度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长芦盐的生产,迨至清初,年产量猛增至 600 万引(每引重 250 斤),纳课税银 70 余万两,相当于清王朝全部盐课的 10%,国库收入的 1%。长芦巡盐御史衙门也

因此由北京迁到天津,天津遂成为长芦盐的总汇之地。

由于取得引岸专销权能获巨利,不但天津本地的殷商富户投资盐业,各地商人也纷纷来津业盐,他们大都因发家而落籍天津。如大盐商张霖,原籍抚宁,清初来津行盐致富。名收藏家安尚义,朝鲜族,落籍奉天,因行盐致富,寓天津,曾捐修天津城。大盐商查氏原籍浙江海宁,后北来,在天津业盐成巨富。诗人金玉冈,原籍浙江会稽;诗人杨光仪原籍浙江义乌,均为来津业盐致富。由于盐商在地方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连皇帝对他们也是“时邀眷顾,或召对,或赐宴,赏赉渥厚,拟于大僚”。1748~1794年乾隆皇帝先后10次巡视天津,有9次“恩恤”长芦盐商,或赐珍品,或减免课税。

盐商虽然富有,但在中国文化本位时代,他们无法进入主流社会。要想改变其身份、地位,当时只有附庸风雅,归附于士大夫行列。于是他们竞相修建园林别墅,争揽南北名士,本名之外都起有别号,还都著有诗文集。一时间,天津园林之盛,冠于蓟北,文运之昌,甲于畿南,绵历数十年而不衰。

如大盐商张霖,别号卧松老衲,建有别业遂闲堂、问津园,著有《遂闲堂稿》;其子张坦、张坝、张霭(渤海秋水道人),均师从名士,工诗善书,著述亦丰。大盐商安尚义、安岐(字仪周,号麓村,别号松泉老人)父子,精鉴赏,收藏甚富,其中精品于乾隆时大半流入内府。龙震,别号东溟山人,建有别业老夫村,著有《玉红草堂诗集》等。大盐商查日乾,别号慕园,一生酷爱文史,曾在南运河畔修建名园水西庄,有诸多名胜,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次驻蹕水西庄;1771年留止园内时,正值紫芥花盛开,遂赐名“芥园”。其子查为仁、查为义、查为礼,均潜心于书画,且才藻横飞,金石鼎彝,藏贮极富;在水西庄外,别建屋南小筑。查氏一家热衷于款接名流,大江南北才俊之士,“凡道出津沽者,一刺投之,无不延揽”;又捐其旧居,建问津书院。盐商家庭出身的金玉冈,别号黄竹老人,好出

游吟诗；李承鸿，业盐来津，亦工诗好客，提倡风雅，建寓游园，内有十景；“查氏衰落，承鸿接轸前轨，虽具体稍微，而风流赖以不坠。”盐商阶层如此活跃，在当时中国的其他城市是不多见的。

盐商社会角色的转换，极大地提高了天津的文化层次，加速了地方文化的积累，从此，天津地方文化成果不断涌现，不少优秀的成果还影响到全国。如安麓村所著《墨缘汇观》，是书画收藏鉴定的权威性著作；又以三千金购得唐人孙过庭《书谱》墨迹，重摹上石，后嵌于扬州康山草堂壁上。查日乾与厉鹗合著的《绝妙好词笺》是极受欢迎的词选笺注本。著名学者王又朴的《易翼述信》，被收入《四库全书》。名画家华琳的《南宗抉秘》，发前人所未发，是中国美学史上的名著。

与此同时，南北名士也把不同方面的文化艺术带到了天津。汪沆的《津门杂事诗》说：“吴老弹棋数第一，柳朱绘事技殊工；黄图他日编方技，掌录人才半寓公。”自注说：“江南吴来仪，浙江柳维新，江南朱锡鬯，皆流寓天津以老。”当年，天津的著名文化人有一半来自外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以盐商为代表的文化摄入，才把传统时期的天津文化推向高峰。

传统文化发达的另一个标志是地方获第者渐多，到了晚清，天津“登乙榜者几占全省中额十分之二，甲榜则占全省中额四分之一。”这，也不能不归功于盐文化的“余荫”。

河海兼容的漕文化

所谓漕文化，其实就是漕运带来的文化，因此这里面包含着运河文化、海洋文化及其所带来的南北文化交融。

大运河通航后，一直是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水上通道；而南北沿海航线的开通，又把海洋文化从南方带到了北方。

对天津来说，从江南地区海运粮、帛，约始于8世纪唐代开元年间，当时海运的进行，主要是解决地处燕山脚下军事重镇渔阳（今蓟县）防军的军需供应问题。如此众多的海运物资，必须有一

个较大的港口进行接纳,据研究,这个港口就是当年坐落在军粮城。《天津卫志》说:“军粮城在(天津卫)城东南,去城七十里,元海运为屯粮之所。”19世纪初修《长芦盐法志》时,“周遭遗址尚存”。近年来,经过考古调查,在军粮城刘台村西南确有古城遗址一座,始建于唐代早期,周围分布有丰富的唐代文物(如瓷器、陶器、铜器和各种建筑材料)以及众多的唐代墓葬,而且历史上就曾经被偶然发现过。清末人郝福森所写的《津门闻见录》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军粮城附近“土人刘姓挑濠,掘出石棺一,极大,上以三道铁匝匝之,并有两大瓷人站立,此葬之极贵者也”。1959年考古学家在刘台村又发现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唐代墓葬,中有大理石石棺一具,上刻青龙、白虎精美浮雕;随葬器物有铜器、瓷器以及大批制作精美的陶俑,陶制家禽家畜和日用家具模型,等等。这充分说明,军粮城一带在唐代是相当繁荣的,并居住着不少富庶之家。元代漕文化主要表现在妈祖文化对天津城市和地方文化的持久影响,这在北方沿海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中国北方的各个沿海港口中,直沽(天津)的妈祖庙建立最早。据《元史》记载:“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大约在13世纪80年代)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直沽、平江、周泾、泉(州)、福(州)、兴化等处皆有庙。皇庆(1312~1313)以来,岁遣使斋香遍祭。”

由于国家的特殊重视,在民间造成了普遍的信仰。清代天津诗人于文豹写有《天后会四十韵》长诗,描述天后诞辰全城上下热闹的祭祀状况,诗中说观者大半凌晨而起,倾城出观,或夫妇同游,虽大户亦不能禁;天后乘辇,仪仗森严,制同王者;届时民间百戏杂陈,游人叠肩踏臂,杂以乡中妇女,外乡人至者,旅舍不能容,须夜宿舟中,以醉饱为乐。天后诞辰的祀典活动多集中于明清时期发展为市中心的东门外天后宫。《津门杂记》说:“天津系濒海之区,崇奉天后较他处尤虔。东门外有庙宇一座,金碧辉煌,楼台掩映,

即天后宫,俗称娘娘宫。庙前一带,即以宫南、宫北呼之。向例此庙于十五日启门,善男信女络绎而来。神诞之前,每日赛会,光怪陆离,百戏云集,谓之皇会。香船之赴庙烧香者,不远数百里而来。由御河起,沿至北河、海河,帆樯林立,如芥菜园、湾子、茶店口、院门口、三岔河口,所有可以泊船之处,几于无隙可寻。河面黄旗飞舞空中,俱写‘天后进香’字样。红颜白鬓,迷漫于途。数日之内,庙旁各店铺所卖货物,亦利市三倍。”

开埠带来的“窗口文化”

“窗口文化”指的是天津被迫开埠后,由于各国租界的设立,在许多方面成为传播近代文明的窗口。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多以租界或租界带来的西方文明为楷模。所以天津在近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开北方风气之先。

先说纷然杂陈的建筑文化。各国在天津的租界划定后,租界当局均按照自己国家的风格与流行手法进行了规划和功能分区,确定了道路和市政工程系统,比如英租界的规划就是后来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最后被苏丹人民杀死在喀土穆的英国军官戈登制定的。19世纪末以前,英、法租界初具规模,基础设施完善,在北方沿海城市中独树一帜。特别是英租界,“街道宽平,洋房整齐,路旁树木,葱郁成林。行人蚁集蜂屯,货物如山堆垒。车驴轿马,彻夜不休。电线联成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一小沪渎焉”。当时著名的建筑有维多利亚公园、戈登堂、圣路易教堂、北洋水师营务处(海军公所)、大清邮局,等等。但是,在20世纪初,由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破坏,英、法等租界的建筑多半未能完整保存。此后,各租界开始了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各国的风貌建筑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这时,恰值西方建筑进入了由古典复兴主义通过折衷主义向现代主义转换的过程,不断变化的建筑风格自然也就在租界地建筑中反映出来;一些租界还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建筑图纸不得重复使用。这样,形形色色的建

筑风格在租界中大量涌现,各式楼房纷然杂陈。从此,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天津的“小洋楼”开始与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北京“四合院”齐名,并得到了“万国建筑博览馆”的雅誉。

广开风气的传媒文化、休闲文化和体育文化

在中国传统的专制社会里,没有大众的传播媒介,政治消息的传播,主要靠“宫门抄”、“邸报”一类,地方的新闻传播则是由衙门胥吏包办的“京报”。这些人自设京报房,雇用抄手,专门抄录重要的公文和邸报,然后由脚夫分送各府、州、县。近代报刊是西方传入的新闻媒介,一般说,它总是出现于外国人最先到达的地方。

天津的报纸,滥觞于海关编辑的《北方邮报》,但只是在 1880 年和 1881 年两个冬季出版,刊登的都是与海关贸易相关的统计数字,很少有新闻和事件的报道。

天津第一份、也是中国北方的第一份报纸《时报》,是在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由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英商怡和洋行经理茄臣共同创办的。《时报》分为中文版和英文版,中文版系日报,于 1886 年 5 月 16 日创刊,主笔是李鸿章特请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氏为有名的中国通,他每天为报纸撰写论说一篇,十天列一总表;在他主持《时报》的一年中,撰写了近 200 篇时论文章,后来他去上海任广学会总干事,便将这些文章辑印为《时事新论》出版,对中国的戊戌维新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时报》的英文版名《中国时报》,中文译名为《益闻西报》,系周刊,每周出版三栏,共 12 页,由英国人亚历山大·密吉任主笔。《时报》的英文版虽是周刊,但系北方惟一的英文报纸,因此北方各地洋人以先睹为快,上海和华中地区的洋人也为尽快得知京津新闻而争相订阅。

《时报》停刊后,报社为天津印刷公司购得,1894 年该公司创办了在中国北方影响最大,被视为“外国人的圣经”的《京津泰晤士报》。该报初为周刊,1902 年改为日报,成为英租界工部局的机关报,主编为著名记者和报人美国人伍德海。